

文化影响国家行为的机理研究

岳汉景 ○ 著 WENHUA YINGXIANG GUOJIA XINGWEI DE JILI YANJIU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财经大学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文化影响国家行为的机理研究

岳汉景◎著 WENHUA YINGXIANG GUOJIA XINGWEI DE JILI YANJIU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影响国家行为的机理研究/岳汉景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650-0361-5

I. ①文… II. ①岳… III. ①文化—影响—国家制度—研究 IV. ①D0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18407 号

文化影响国家行为的机理研究

岳汉景 著

责任编辑 疏利民

特约编辑 陈 颖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印 张	11.75
	发行部:0551—2903198	字 数	190 千字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
E-mail	press@hfutpress.com.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361-5

定价: 2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摘要

本书主要探究的是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为什么能够影响外交政策？是怎样影响的？基于这一研究目的，本书“由论到史”分为两大部分：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

第一部分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的哲学原则，主要采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对关键概念作了界定，揭示了概念自身的辩证矛盾，发掘了概念间的联系，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把它们逻辑地联结起来形成假说。基本假设是：（1）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2）人（国民）决定国家利益；（3）文化影响人。假设之间的逻辑链条是：文化影响人，人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这就是说，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以“人”和“国家利益”为中介的。“文化”和“国家利益”是本书的核心概念。这就回答了文化为什么能够影响外交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利益来源于人的需要，它的产生经历了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为了生存必须设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即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人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并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而且

还支配着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这就使人与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需要由此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于是利益产生了。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

由利益的产生过程可知，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统一。利益的实现是需要的满足，即需要客体的获取，而需要对象的获取决定于手段——社会关系，以及利益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利益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由其所享有的相对权力决定的。因此，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利益的核心是权力，特别是相对权力。利益的判定首先是对需要对象的评价与确定，其次是对获取需要对象的手段、能力的评估。对需要对象的评价与确定过程其实是价值判断的形成过程。因此判定了的利益具有价值性。

国家利益是特殊主体的利益，除具有其自身独特性以外，也具有利益的一般特点。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国际政治中除表现为阶级关系外还表现为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家利益的核心也是权力。对国家利益的判定首先要确定需要对象，其次要对实现需要的手段进行评估。判定了的国家利益具有价值性。

本书以国家利益的判定特点为基础，结合价值判断的形成过程的知识揭示了文化影响国家利益的内在机理，从而具体回答了文化是怎样影响外交政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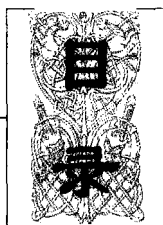
国家利益包括物资利益和精神利益。由于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权力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以及暴力（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而且物质的东西不但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还能够至少部分地满足精神需要，因此物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从总体上证明了作为精神的东西的文化对决定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尽管是重要的，但却是相对有限的。

文化以两种形式影响外交政策：一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动力因素，这种动力因素与外交政策的权力动因常常是一致的；二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内容，表现为以文化保护和文化输出为特色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中文化是国家权力诉求的工具。文化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大国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持久的影响，但由于权力构成的基础是物质，因而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第二部分以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为例对第一部分作了实证：把该计划置于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中，分析了其宏观和微观历史背景，说明了“大中东计划”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延续，进而表明文化对外交政策具有持久的影响，但同时也表明以文化为内容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可选择性；结合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了“大中东计划”的文化影响机理和硬权力动因，说明了文化虽然为美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提供了形而上的逻辑和现实内容，从而为美国的扩张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但这种动力相对于源自物质利益的动力是有限的。

结语部分对本书的核心内容——文化影响外交政策的机理作了总结。

MU LU



摘 要	(1)
--------------	-----

导 言	(1)
--------------	-----

一、论文的选题	(1)
---------------	-----

二、理论假设及其逻辑关系	(9)
--------------------	-----

三、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17)
-------------------	------

四、结构安排	(18)
--------------	------

第一章 文化影响外交政策的机理	(19)
-----------------------	------

第一节 文化的含义与“化人”功能	(19)
------------------------	------

第二节 国家利益与外交政策	(25)
---------------------	------

第三节 外交政策的文化影响机理	(48)
-----------------------	------

小 结	(72)
--------------	------

第二章 “大中东计划”的提出及其内容	(74)
第一节 “大中东”的含义	(75)
第二节 “大中东计划”的提出及其内容	(78)
小 结	(87)

第三章 “大中东计划”的历史背景	(89)
第一节 “大中东计划”的宏观历史背景	
——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全球表现	(89)
第二节 “大中东计划”的微观历史背景	
——“输出民主”战略在中东的实施	(108)
小 结	(121)

第四章 “大中东计划”的文化影响机理探析	(123)
第一节 美国的理想身份及其扩张逻辑	(123)
第二节 美国现实身份的演进与意识形态扩张	(131)
第三节 “大中东计划”的硬权力动因	(138)
小 结	(148)

结 语	(150)
一、对本书“文化”的再说明	(150)
二、文化影响国家利益及其判定的内在机理	(152)
三、美国文化对“大中东计划”的影响	(155)

参考文献	(158)
一、英文参考文献	(158)
二、中文参考文献	(168)

后 记	(179)
------------	-------

导 言

一、论文的选题

随着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国际交往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有了显著变化。在质的方面表现为交往手段和方式的变革,在量的方面表现为交往主体种类增加、数目增长,交往范围扩大、深度拓展。于是,出现“地球变小了”的惊叹。唐人韦应物的诗句“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所描述的情境如今是一去不复返了。国际交往的变化使地区经济集团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突出,国际政治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的同时又夹杂、渗透着“一言难尽”的文化因素。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治理问题愈益突出。世界发展的现实,要求我们研究、探索国际关系时,既要看到国际问题的国内因素,更要注意国内问题的国际因素,在全球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面前,内政与外交的传统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不清。同时,由于政府在应付全球性问题时常常力不从心,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已经不能也无法仅限于国家等国际行为体的关系的范围。难怪有学者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和探讨国际行为体相互关系及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社会发展变化的一门学问。”^①可见,国际关系问题范围广泛,种类繁多。

“科学探索始于问题”,^②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当然也要从问题开始。国际关系问题领域如此广泛、复杂且林林总总,如何选题是关键。“一

① 楚树龙著:《国际关系基本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第2页。

② 刘大椿主编:《科学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个真正有价值的问题需要符合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问题尚未回答或尚未完全回答，二是问题有现实科学意义，三是问题有回答的可能。”^① 第一个原则其实是选题的创新性原则^②。创新包括原创型和拓展型两种。原创型创新的关键是选题要新；拓展型创新是指在旧有选题的基础上辅以新材料或新方法并由之形成新观点。第二个原则其实是需要性原则。需要包括社会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就是说要有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第三个原则其实是可能性原则。这主要指完成选题的主客观条件：主观条件是研究者的知识、能力、兴趣等；客观条件是研究者的资料、时间、财力、导师指导等。笔者主要是以上述的原则为基础进行选题的。

在对国际关系众多问题的研究中，对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历来是重点，而且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以及人们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诸多相关理论成果，它们对比如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因素给出了各具特色、颇有创意的解析，并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理论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示，影响外交政策的因素很多，但不同的理论流派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物质权力结构因素或人性特点（如现实主义理论），有的强调制度因素（如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民主和平论、理想主义），有的则突出文化因素（如建构主义理论、文明冲突论）。

受约瑟夫·奈“软实力”^③概念和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以及建构主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吸取了文化研究的观点，把文化作为其所研究的变量之一，文化与外交、文化与国际政治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对文化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上以文化输出和文化压迫为标志的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范围。文化是构成国家特性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是影响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变量。王缉思先生曾指出：“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

① 阎学通、孙学锋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2页。

② 参见谭培文、邱耕田、张培炎编著：《哲学论文写作》，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该书还提到学术性原则。但笔者认为学术性原则可以包括于需要性原则之内。

③ 约瑟夫·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软实力”概念。参见[美]约瑟夫·奈著：《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吴晓辉、钱程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中文版序言”，第1页。

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① 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并对世界事务具有一定的影响，她有着独特的文化优势，但在对外关系上如何充分利用我国自身的文化优势，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和壮大，依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注意文化对外交的影响的研究。本书即着重尝试性地探讨文化^②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文化为什么会影响对外政策？是如何影响的？

对于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个问题，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出现了一些学理深厚、颇具洞见、影响广泛的研究成果：例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著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③，塞缪尔·亨廷顿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④，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所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⑤。这些书中的观点和方法对笔者论述外交政策中的文化因素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的文化多指无明确民族性、区域性的政治哲学或社会哲学思想，比如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以及其他各种在国与国之间、国家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共有观念”^⑥，在含义上有些过渡泛化，与本书中的文化概念是不可通约的。温特夸大了他所指称的文化的的作用，在向人展示文化观念的建构作用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观念形成的客观物质基础。例如，温特说：“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意义和内容并因之产生作用，首先是因为观念使然。让我们想一想德国和丹麦之间权力的差距。这两个国家的权力差距在1940年和2000年这两个时间点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由于1940

① 王辑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编：《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页。

② 本文的文化主要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超历史的传统文化精髓，以及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它是对该国身份的回答。这一点将在第一章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③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

⑤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美] 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⑥ 方长平著：《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4页。共有观念一般会归入上述三种“文化”类型。

年德国的国家利益不同于 2000 年的国家利益，德国的军事力量也就有了不同的意义，并因之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德国国家利益的内容是根据德国对它和丹麦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而确定的，也就是说是根据涉及自我和他者的观念所决定的。德国在 1940 年把丹麦视为没有生存或自由权利的敌人，在 2000 年则把丹麦视为朋友。换言之，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是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① 国家利益的内容是“根据涉及自我和他者的观念所决定的”。这个前提是值得质疑的，利益虽然受观念的影响，但观念本身绝对不能决定利益，否则一些执迷不悟的法轮功信徒就不会因笃信法轮大法，拒绝科学的药物治疗而丧命了，要知道他们本来是绝不愿意死的。德国对丹麦由敌人观念到朋友观念的演变实际上是客观经济、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即便如今的德国在观念作用下把丹麦看作敌人，它也不敢对其动用军事力量，因为德国首先受北约这一现实的客观性军事政治组织的严重束缚。退一步，我们假定 1940 年德国对丹麦的敌对行动是由于受到德国法西斯观念的支配，但二战的结果之一是德国的分裂。这说明如果按照没有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观念行事，必将导致利益受损。总之，观念不能决定利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观念是对客观物质世界反映的结果，尽管这种反映可能是虚幻的、歪曲的。“观念只是被用来整理已存在着的实践，而不是被用来开创新式的秩序。”^② 不是物质通过观念起作用而是物质本身就起决定作用。“观念的东西不过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反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③ 人的需要在内容上的客观性决定了由人组成的国家的对外政策不可能由观念决定。但建构主义关于“利益不是存在‘那里’等待被发现，而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起来的”^④ 的观点是深刻的，而且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尽管不乏片面性（笔者将在第一章第二节探讨其片面性）。

温特还强调了政策决定者的道义责任，论道：“与新现实主义和新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40 页。

②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美] 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2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12 页。

④ Mar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

自由制度主义比较起来,建构主义理论更加强调对外政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因此也就更加强调他们的道义责任。”^①“强调对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并不能作为“强调他们的道义责任”的理由。这里显然隐含着作者的价值假设:对外政策决策者应该讲道义。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对外政策决策者曾经强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②,阶级利益、国家利益应服从于全人类的利益。他显示了鲜明的道义责任,同时又“释放了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③,结果虽然不是决定了但也无疑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自己的总统宝座也没有保住。肯定没有人会认为自己的国家分裂、解体是符合国家利益的。

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部分地说明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失效^④。这一论断似乎被不少人接受了。然而,笔者认为这充分证明了如果对外政策决策者不按照现实主义原则办事,过分强调对外关系上的道义原则,那么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这恰恰说明了现实主义较强的解释力。对外关系上,当然不能丝毫不讲究道义原则,现实主义也不是一概地反对讲道义原则,但是讲道义原则要以增加国家的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事实上,温特的理论比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决策者的道义原则,不是因为它“更加强调对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而是因为该理论本身包含了一个根本性的信仰性假设——国际社会是会朝着世界政府和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大同方向发展的。然而,正如现实主义所认为的“政治不是道德哲学的实践”,^⑤“所谓合作、协调、整合等等新出现的现象或过程,归根到底只是某种‘良性抑

① [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② [苏] 戈尔巴乔夫著:《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

③ [美] 杰弗里·庞顿、[美] 彼得·吉尔著:《政治学导论》,张定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④ “近十年来,西方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新现实主义没有能够充分解释和说明冷战的结束……”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220页。

⑤ [美] 詹姆斯·多尔蒂、[美]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制’的手段，并非道德律或价值观使然”^①。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与本书题目中的“文化”有较多的共有含义，但亨廷顿过分夸大了文明对于国际冲突的动力作用，他早在1993年就说：“在冷战后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基本源泉将不再首先是意识形态或经济，而是文化……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于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下一次世界大战，如果有的话，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②在这里，他把文化作为“冲突源泉”的发生时间定位在冷战后，这就很让人怀疑其论断的科学性，他甚至难免有为美国作对外行为向导的嫌疑。因为冷战的结束使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文明”与“冲突”这两个变量之间假使有突出的因果相关性的话，会否仅仅是伪相关，即它们的相关性是以第三个变量，如美国独霸世界的诉求的存在为存在基础的呢？^③例如，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但这种地位却不是由该体系引起的，即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美元霸权地位确立的原因，而是战争环境赋予美元力量，布雷顿森林体系使这种力量在世界体系中组织化和制度化。美元的霸权地位是战争前后和战争中黄金大量流入美国的结果，以及美国生产率优于其潜在对手的结果。一句话，是美国超强实力作用下的结果。

冷战是以美苏争霸的权力政治为主要特色的，它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权力争夺的终结，文明不可能是所谓“冲突的基本源泉”。从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冷战的结束意味着‘权力政治’的一个特殊时代的终结，但并不意味着作为国际关系之本质的权力斗争和权力竞争的完结。”^④ 质

①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转引自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

③ 变量间因果关系有三个必要条件：在时序上，先有因后有果；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实证相关性；两个变量的实证相关不因为第三个变量的存在而存在。参见[美]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基础》，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为了更好地说明因果关系的第三个条件巴比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不能因为冰淇淋的销售量与淹死者的数量呈统计正相关就说冰淇淋的销售是造成人溺亡的原因，事实上，第三个变量——季节或温度才是关键，因为大多数溺水事件发生在夏季高温时期，而这时也正是冰淇淋销售的旺季。

④ Bruce W. Jentle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Dynamics of Choice in the 21st Centur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p. 271.

言之，文明冲突之说乃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学术归旨的亨廷顿代表美国政府所释放的欺骗性行动宣言。因为冷战后苏联已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崩溃，意识形态作为凝聚欧美的核心概念也随之失去了功效，而必须以文化这一具有更大外延的概念取而代之，以重塑敌人^①，维系欧美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隐蔽地为欧美引出新的合作任务，如拓展民主，扩大和巩固美国护持霸权的最重要工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②。

笔者对温特和亨廷顿关于与本书论题有关的内容的论述进行了有重点的评论，旨在说明他们过分夸大了文化观念对外交政策的作用，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现实物质利益动因，“实际上，观念只有同物质利益或权力关系的变化相联系，才能在政治上产生影响”^③。特别是温特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人的客观需要出发谈论国家利益，就难以充分揭示国家利益的本质。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唯心主义影响下，“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动”^④。

《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把观念分为三种信念：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因果信念。^⑤ 因果信念主要指科学知识，与本书中所说的文化概念联系不大，但世界观与原则化信念与本书的“文化”在含义上有较多的“交集”，因此该书相关论述对笔者也有一定的启发。作者把观念在功能上也分为三种：作为路线图的观念、作为焦点和黏合剂的观念、制度化的观念，以此为基础具体探讨了观念影响政策结果的三条路径，表明了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为对外政策的决定因素。但他们也只是对一些经验性的例子进行了创造性地归纳总结，找出了观念影响政策选择的主要模式，但并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提出观念对政策选择施加影响的机

① 美国学者从政治和心理学的角度论证过树立敌人对美国的重要意义，认为：“一个共同的敌人将有助于促进人民之间的认同和凝聚力。削弱或缺乏一个共同的敌人，则可能带来相反的影响。” Joseph S. Nye, “Re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8, Iss. 4, July/August, 1999, pp. 22-35.

② 亨廷顿认为：“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重要安全组织。”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③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美] 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16页。

⑤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美] 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理。例如，他们虽然正确地指出“不仅是客观局限性和机遇引导着行动，个体还依赖于信念和预期在一系列可行的结果中做出抉择”，但他们在文中只是细化了这一观点而并没指出信念和预期为什么可以被用来这么做。在谈到观念与利益的关系时，虽然他们承认“从现象学上看观念和利益并不是分离的，所有的利益都牵涉到信念，并因此牵涉到我们所设想的观念”^①，但他们并没有从逻辑上说清信念是如何影响利益的。

探讨文化与外交政策的国外著作还有：迈克尔·亨特的《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②、肯尼兹·汤姆森的《政治与外交中的传统和价值观：理论与实践》^③、茱蒂兹·班彻的《人权与美国外交：1975—1977》^④、莫里尔·赫尔德和卡普兰·劳伦斯的《文化与外交：美国的经验》^⑤、弗兰克·宁科维茨的《外交理念：美国外交政策与文化关系》^⑥、米切尔·奥斯林的《与帝国主义谈判：不平等条约与日本的外交文化》^⑦、福雷斯特·摩根的《强制性与帝国主义日本的战略文化》^⑧等；国内有：王晓德的《美国文化与外交》^⑨，计秋枫、冯梁等著的《英国文化与外交》^⑩、汪波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⑪，另外张骥的《国际政治文化学导论》^⑫，张骥、刘中民等著的《文化与当代国际政

① [美] 朱迪斯·戈尔茨坦、[美] 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②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③ Kenneth Thomp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④ Judith Buncher, ed. *Human Righ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1975—1977*, Facts on File, Inc., 1977.

⑤ Morrel Held and Lawrence S. Kaplan, *Culture and Diplomacy: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onnecticut Press, 1997.

⑥ Frank Ninkovith, *The Diplomacy of Ideas: U. S. Foreign Polic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⑦ Michael R. Auslin, *Negotiating with Imperialism: 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Culture of Japanese Diploma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⑧ Forrest E. Morgan, *Compell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of Imperial Japan*, Praeger/Greenwood, 2003.

⑨ 王晓德著：《美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

⑩ 计秋枫、冯梁等著：《英国文化与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

⑪ 汪波著：《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文化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⑫ 张骥等著：《国际政治文化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治》^①，朱威烈主编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②，张玉国的《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③，赵有田等著的《综合国力竞争与文化冲突》^④，孙晶的《文化霸权理论研究》^⑤，李智的《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⑥等也对外交中的文化因素有所触及；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更多，其中一部分将会在“参考文献”中出现，笔者在此不再一一列出。

上述著作大多采用历史的叙述方式，系统探讨一个国家的文化与其外交政策的关系，基本上是从文化的视角阐述国家的外交史，为人们提供了较为宝贵的实证性材料，展示了文化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方面丰富的个性特征，便于人们发现两者关系中的共性、规律性。它们的“文化”的含义大都比本书文化的含义宽泛一些，研究对象上也广泛得多，除了研究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外，还研究文化对外交方式和外交行为以及国际关系的影响等。

本书试图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一般意义上或者从理论层面上研究文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规律性，探究文化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内在机理，而不只是提供一些历史材料归纳说明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二、理论假设及其逻辑关系

“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正是通过某种模式或智力框架实现的。没有这种框架，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或与世界相联系。”^⑦ 由于中国目前还没有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谈分析模式的话，那么笔者要说，本书

① 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 朱威烈主编：《国际文化战略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张玉国著：《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④ 赵有田等著：《综合国力竞争与文化冲突》，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

⑤ 孙晶著：《文化霸权理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⑥ 李智著：《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⑦ [美]杰弗里·庞顿、[美]彼得·吉尔著：《政治学导论》，张定淮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